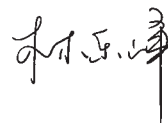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布洛維的社會學遺產

### 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 ——紀念布洛維與賴特



作為一種理論傳統，思想被認為是隨着它力圖了解、改造的物質世界而改變的。因此，每個時代都在改造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以發展這個理論傳統來解決時代的問題。

——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①

#### 一 緒論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曾經陷入對立冷戰。以美國為代表的戰後西方社會學抱着消滅共產主義的態度，將馬克思主義擋在學科大門之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則成為解釋社會變革的唯一理論，社會學專業作為危險的資產階級學說遭到廢除。1970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從對抗走向和解。陷入危機的美國社會學——一種基於和諧與共識的社會學對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束手無策，通過借鑒馬克思主義得以復蘇；實施改革開放的中國則面臨社會主義危機和重建的歷史時刻，但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卻幾乎沒有為「社會」留下一席之地，社會學在修復社會的煉火中重生。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從對立走向了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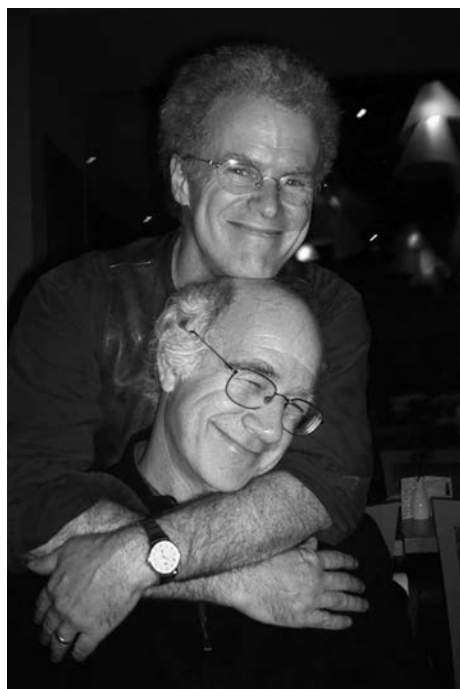
與西方社會學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術傳統對待的情況不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與進化的國家意識形態纏繞在一起。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學院培養了眾多學科教育工作者，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解讀馬克思主義文本與黨的執政和建設綱領，以及傳播這些意識形態解讀，這裏的馬克思主義和正在發生的社會現實很少有直接聯繫。另一方面，由於馬克思主義研究幾乎等同於研究意識形態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以至於很多人無法理解構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意涵，或者將這種意涵誤解為政治要求——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學科建設，於是不得不為專業工作披上一件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因此，

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壓向社會學，成為社會學發展的負擔，它既難以促進學科發展，同時也因為框限社會學的探究議題而阻礙了其自身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正如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1947-2025) 所說：「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簽訂了一份不平等條約。不平等的方向根據哪方吸收哪方而不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區別所在。這兩種混合體的共存既可互損，也可互益。」<sup>②</sup>問題在於，如何互益？

布洛維和賴特 (Erik O. Wright, 1947-2019) 是二十一世紀初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和世界著名的社會學家<sup>③</sup>，這兩位同年生人是彼此最犀利的批評者，也是彼此最堅定的支持者。在上世紀 70、80 年代，他們分別憑藉原創性的勞動過程分析和階級結構分析，確立了自己對社會學專業的貢獻，但是他們從未將自己的學術事業僅僅放置於社會學，而是不約而同地將重建馬克思主義視為自己餘生重要的學術議程。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們以追憶、反思和繼承二位學術巨匠貢獻的方式來紀念他們時，馬克思主義在對他們的懷念之詞中尷尬地消失了，也許是因為過去三十年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學中處於低調的防守態勢，又或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理論糾纏不清。可是如果不談馬克思主義，面對將自己首先定義為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布洛維和賴特，我們情何以堪？尤其重要的是，二位學者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之間的穿越之旅，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如何與社會學相得益彰。

在本文中，馬克思主義不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的經典著述，它包含由這些著述引發的批判和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針對歷史上的社會發展案例的理論解釋。確切來說，它是指一套批判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包含著一系列隨着歷史演變而出現的思想、理論、矛盾和悖論，對它的貢獻既來自革命家、政治家，也來自社會科學家。不同於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即基於政治和組織目標，從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選擇、重組的一部分理論原則和命題所構成的一套信仰體系，重建馬克思主義是針對新的「異常」（不符合既有理論預測的現象）發問，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實證材料，發展出新觀點並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命題或概念。新的發現和理論化有可能與當下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產生張力，但也有可能在未來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今天馬克思主義為甚麼依然重要？那不是因為外在的政治要求，也不是因為馬克思本人是重要的社會學奠基人之一，而是因為：第一，馬克思主義曾經且依然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最系統批判的理論學說；第二，馬克思主義依然激發我們對當代最迫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進行有意義的提問和思考，其答案直接影響人們的福祉；第三，即使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挑戰和回應也滋養着其他多元的批判社會理論發展。



布洛維(下)與賴特(上)，攝於2002年。(圖片來源：<https://sociology.berkeley.edu/memorial-michael-burawoy>)

本文將回顧布洛維與賴特二人學術思想的形成軌迹，通過重新審視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遇、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開拓社會學研究領域，以及批判性地運用社會學重建馬克思主義，希望揭示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 (Marxist Sociology) 發展中作出的十分重要卻未得到足夠重視的理論貢獻——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Sociological Marxism)。

## 二 遇見馬克思主義

布洛維和賴特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和許多左翼學者不同，他們也不是先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再運用馬克思主義從事學術研究。生活經歷中的機緣巧合和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思考將他們引向馬克思主義。

賴特在美國堪薩斯州一個幸福的知識精英家庭中長大<sup>④</sup>，很早就認為自己會成為一名學者。他從小就是中國父母語境裏那種「別人家的孩子」，成績優異，卻又為人簡單、善良和謙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時期裏，人們無需為未來做過多打算，賴特跟所有的高中朋友一樣，打算按部就班地升入堪薩斯大學，並在高中就積累了不少堪薩斯大學的學分，直到一位朋友將一張哈佛大學的申請表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他，而哈佛是他後來唯一申請就讀的學校。

1968年，在哈佛讀四年級的賴特製作了一集名為《象棋遊戲》(*The Chess Game*)的動畫短片，作為一門動畫課的結課作業。在動畫片的故事中，很多被吃掉的棋子倒下後被踢出棋盤，堆積在一起的雙方棋子開始交談。不久，巴洛克時期的鍵琴音樂響起，它們開啟了一場激烈的戰鬥，掀翻並逐出棋盤上的貴族棋子。隨着《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響起，棋子跳起賴特最喜愛的弗吉尼亞輪舞 (Virginia reel)。但故事沒有結束，畫面再次出現，棋子列隊回到棋盤準備新一局遊戲，只不過這一次，它們和昔日的王權將相調換了位置。《象棋遊戲》如同一則寓言：只變換棋子角色而不改變棋盤的結構和規則，那終究還是一套舊遊戲。1968年正是左翼社會運動的歷史性時刻，馬克思主義在賴特對社會的思考意識中不自覺地逐步浮現。儘管賴特當時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已經產生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直覺。

在哈佛取得社會研究 (Social Studies) 學士學位後，賴特獲得前往牛津大學學習兩年的獎學金，又在那裏成為歷史學士。他醉心於旅行、閱讀和接觸新鮮事。1970年，他回到反戰運動中的美國，註冊入讀了在加州柏克萊 (Berkeley) 的斯塔爾·金牧職學院 (Starr King School for the Ministry)，以免被徵兵去越南。在牧職學院的一年，賴特作為學生牧師在聖昆廷監獄 (San Quentin) 積極參與了名為「監獄法律項目」(Prison Law Project) 的維權行動團體，該組織將進步的黑人囚犯與左翼律師連接起來，致力於通過訴訟和其他形式的行動來挑戰監獄管理。他決定與參與項目的朋友撰寫一本關於聖昆廷監獄的書，這本書最終出版為《懲罰的政治：對美國監獄的批判分析》(*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risons in America*)<sup>⑤</sup>。

1971年秋，賴特入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一年級時完成了《懲罰的政治》。書中大約一半內容由他本人撰寫，其餘部分則由囚犯以及與「監獄法律項目」相關的其他人士撰寫。正是該書的完成讓賴特意識到，他對監獄體制的批判不再如《象棋遊戲》那樣跟隨直覺，它不僅與馬克思主義兼容，它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據賴特自己所言，在這一刻，他自然地「發現」（而不是「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開始在舊金山灣區開闢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康莊大道。

戰後的經濟繁榮和優越的家庭養育讓聰慧、勤奮和充滿求知欲的賴特走上一條頗為平坦的求學之路。雖然年輕的賴特沒有深入閱讀過馬克思著作或捲入左翼政治行動，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時代孕育着他思考社會問題的批判意識，讓他自發地向馬克思主義靠攏，不論是在智性的《象棋遊戲》裏還是在學生實習中，以至於他踏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時，都是如此平淡無奇，而這也醞釀出他在學術上溫和、理性、堅定的性格。

雖然同樣出生在一個猶太裔知識精英家庭，布洛維的道路更為曲折和充滿冒險精神<sup>⑥</sup>。1933年，他的父母為逃避納粹，從德國的萊比錫搬家到英國的曼徹斯特，只有父親在當地科學技術大學找到一份講師工作，一家四口在城市南部過着中下階級的生活。父親在布洛維十一歲時不幸去世，母親只能找到工資微薄的工作，不得已將家裏的部分房屋出租給當地就學的國際博士研究生，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讓布洛維對英國之外的世界產生了好奇（雖然他那時的夢想是成為天文學家）。1965年，十七歲的布洛維登上一艘前往美國費城的挪威貨輪，在好奇心和勇氣的驅使下於入讀劍橋大學前開始了一次為期六個月的探險之旅。他遇到的是一個陷入社會運動風暴中的美國，民權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反戰運動讓他興奮不已，孕育了他餘生的樂觀精神，但也讓他對後來的劍橋生活感到枯燥乏味和暗淡無光。

儘管讀的是數學專業，布洛維總是利用每年暑假逃離劍橋去探索未知的世界。1966年暑假，他懷着「教育是世界上的萬能藥方」的信念來到種族隔離下的南非。那裏，他看到正式的高等教育對黑人而言遙不可及，教育不平等的問題開始縈繞在他的腦海裏。1967年夏天，做了充分準備的布洛維跑到印度，他想去弄清楚，對當地的高等教育來說，大學生使用哪種語言學習更為適宜。他後來得出一個結論，這根本不是哪種學習語言更有效的問題，圍繞教學語言爭論的背後是當地的政治鬥爭。令他印象更為深刻的是印度的社會不平等，他感覺再也「無法重新回到1967年之前尚未被印度改變的生活」。他放棄了天文學家的夢想，但卻對未來的方向一無所知。

布洛維完全不像賴特很早就認為自己將成為一名學者，更沒有像賴特那樣在哈佛畢業後轉向另一所名校繼續深造，1968年畢業後，他回到南非與世界碰撞，成為一家周刊的國際事務專欄記者，但很快就厭倦了循規蹈矩的工作和生活，不久便轉戰到獨立後的贊比亞。在贊比亞大學，南非共產黨員、社會學家西蒙斯（Jack Simons）和荷蘭人類學家范維爾森（Jaap van Velsen）幫

助他發現了馬克思主義。對未來依然毫無頭緒的布洛維遇到了西蒙斯，鑒於布洛維與英美資源集團 (Anglo American Mining Corporation) 一位高管有一些交情，西蒙斯建議他去研究獨立後贊比亞的銅礦公司屬於誰的問題，這向布洛維打開了社會學研究之門。

1970年，布洛維註冊入讀了兩位導師在贊比亞大學開創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碩士課程。范維爾森在社會學專業上對布洛維的影響更重要，鼓勵他使用階級（而不僅是膚色）的目光來審視「贊比亞化」(Zambianization，即勞動力以至管理階層的本土化)的銅礦管理與用工。同時，范維爾森關注移民用工制度的視角對他產生了持久影響，布洛維後來基於此，在《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發表了可能是他最出色的一篇論文〈移民勞動的功能與再生產：來自南非和美國的比較材料〉(“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⑦，提出了後來在中國勞工研究中熟知的「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理論，即勞動力再生產的維持和更替被人為地在地理空間上通過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安排所分割，由於工人在工作地沒有完整的公民權利，以及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被強制由工人的來源地承擔，因此形成一個低成本的移民用工體制。

1971年，布洛維完成了《銅礦中的階級之色：從非洲人的晉升到贊比亞化》(*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的手稿⑧，並以此作為寫作範例申請了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項目。從該書可見，除了師從西蒙斯和范維爾森，布洛維還受到法農(Frantz Fanon)對後殖民社會階級分析的深刻影響：法農對阿爾及利亞的分析表明，殖民主義是一種全面的結構性暴力，真正的去殖民不僅是政權更替，而是社會結構、主體形態與世界關係的根本重建；布洛維將法農的觀點擴展到對「贊比亞化」問題的理解：獨立後的民族資產階級只是接管了殖民的國家機器，卻維持原有的剝削秩序。這多像賴特的《象棋遊戲》！

窘迫的少年生活和對多元文化的接觸，讓聰明果敢的布洛維對陌生的外部世界充滿好奇和嚮往。他將自己投入社會運動席捲中的美國、種族隔離下的南非、貧富極度分化的印度和民族獨立後的贊比亞。他意氣風發，充滿着探索世界的激情。雖然沒有清晰的前進方向，但對社會不平等的憎惡和思考的直覺把他帶到西蒙斯和范維爾森的身邊，又在閱讀中與法農對話。他在與不平等秩序的碰撞中彎彎繞繞地發現了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而這也孕育出他在馬克思主義學術之路上犀利、感性、鬥志昂揚的樂觀性格。

### 三 開闢馬克思主義社會學

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在風起雲湧的世界裏喪失了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社會學家在自己眼前洶湧的社會衝突中陷入道德和政治失語的尷尬。如

何理解經濟繁榮與社會危機共存的悖論呢？在那個時代，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存在的批判社會科學傳統，但即便是馬克思本人也未曾料想過經濟繁榮下的社會危機——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無法解釋的悖論。社會學需要馬克思主義把自身從資產階級霸權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需要社會學來超越自身僵化的經濟決定論。時勢使然，年輕一代的左翼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擔負起開闢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道路的使命。

如前所述，1971年，賴特進入柏克萊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舊金山灣區是全美激進思潮的中心，批判社會理論成為校園生活的核心內容，尤其是在社會學系裏，但問題是，沒有老師能為青年講授馬克思主義。賴特幾乎沒有上過社會學系的任何課程，他和其他左翼師生一起參與若干馬克思主義學術期刊的工作，如《叛逆社會學家》(*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現稱《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資本主義·國家》(*Kapitalistate*)和《政治與社會》(*Politics & Society*)。圍繞《資本主義·國家》成立的灣區進步學生團體受到普蘭察斯(Nicos Poulantzas)、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等學者啟發，積極開展每周的讀書會，專心寫作關於國家、階級關係、資本主義危機、意識形態的理論文章，在工作坊中寫作、匯報和辯論，以集體的方式編輯和出版學術成果。作為一名積極的成員，賴特協助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家聯盟」(Union of Marxist Social Scientists)和「西海岸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會議」(West Coast Socialist Social Science Conference)。他還和同學一起組織開設了一門研討課「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中的當下爭議」(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Marxist Social Science)，它成為柏克萊70年代的一門重要課程。灣區的進步學生團體儼然已成為柏克萊的「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為博士生和活動組織者，賴特從各種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冗長辯論中發現，馬克思主義裏有很多功能主義解釋(非因果機制解釋)和無法驗證的概念。在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階級結構與收入分配》(*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中，他決定從一個廣為人知、卻難以解決的謎題入手——如何定義「中產階級」<sup>⑩</sup>。當時的一種觀點認為中產階級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造就的幻象，作為勞動者的中產階級終究會加入無產階級大軍；另一種觀點認為中產階級是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職業經理人、專業服務人士等組成的新階級，但隨着資本主義發展，他們最終會被吞噬、替代或消滅。總之，社會最後只會剩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論哪種觀點正確，它們實際上都認為中產階級沒有重要的理論地位，迴避對中產階級的分析，而這與現實中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穩定的資本主義現象相比，顯得十分突兀。

賴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三個基本階級：資本家(僱主)、勞動者(僱員)和小資產階級(個體戶)，但同時也出現了介於這三個基本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通常是中產階級)：經理和主管(介於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小僱主(介於小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之間)、半自主僱員(semiautonomous employees，介於勞動者和小資產階級之間)。這些中間階層構成了「階級關係內的矛盾

位置」(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class relations)，即兼具相鄰階級特徵的位置，從而調和僵化的階級對抗理論與處於模糊位置的各類中間階層之間的不相容性。賴特指出，運用這些衡量標準，工人階級規模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既有的定義。在《階級結構與收入分配》中，他利用密歇根大學調查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現有數據，論證了他提出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模型比社會學的「地位獲得」(status attainment)理論和經濟學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理論，更有效地解釋收入不平等。特別重要的是，他的量化研究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在美國社會學中獲得了學界認可，一種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誕生了。

不久，一群以概念清晰、邏輯縝密、以實證研究為依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走到了一起。1981年，賴特受邀加入了當時由科恩(Gerald A. Cohen)、羅默(John Roemer)、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埃爾斯特(Jon Elster)等組成的「九月小組」(September Group，每年9月在倫敦相聚三天)。鑒於對傳統馬克思主義中決定論、功能論的抽象性和模糊性缺陷的不滿，他們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命題和概念拆解，然後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分析技術以及理論對其審視、再造和檢驗。雖然小組內部在幾乎所有學術問題上都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但共同的問題意識、方法論取向和價值承諾塑造了一種別具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他們稱作「分析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

早在1978年，賴特便計劃進行一項美國、意大利和瑞典的比較研究，其後於1980年代先後四次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支持，開展了累計約十五個西方國家的階級結構和階級意識的跨國比較研究<sup>⑩</sup>，雖然研究的規模與日俱增，但結果卻愈來愈微不足道。賴特原本計劃為他的階級分析畫上句號，然後轉入他更為關切的國家政治和社會變革問題，沒想到卻陷入了另一項難以輕易放棄的龐大事業(下詳)。隨着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熱潮在80年代回落，分析馬克思主義也逐漸走向終點。

當分析馬克思主義致力於概念清晰、理論邏輯縝密、以實證為依據的科學剖析時，它也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問題，將自身從具體的歷史中抽離，無法與工人階級開始面臨的全球化苦難共振。賴特的階級概念和自變量設計更為精緻可靠，已經可以解釋經驗中更多的因變量以及它們的變化範圍，他將以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為方法論根基的階級分析完全轉化成為一種社會學方法，聲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任務是解釋獨立於理論本身而存在於世界上的真實現象。」<sup>⑪</sup>預測、批判和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向已不復存在，馬克思主義被精緻打扮後轉嫁給社會學。

與賴特成長於灣區濃厚的激進政治氛圍和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網絡中相反，布洛維則在1972年闖入了芝加哥大學這座保守主義的堡壘——柏克萊和芝加哥兩所大學在校園文化(學生行動主義)、知識和政治立場(學術與政治關係)上截然不同，這是贊比亞之後的又一場冒險。他期望能參與關於發展研究以及都市民族志的欣欣向榮的討論，卻發現致力於對亞非新獨立國家進行研究

的芝加哥新國家委員會 (Chicago's Committee on New Nations) 已經停止運作，芝大社會學系的都市民族志傳統亦已式微<sup>⑫</sup>。遊遍世界後的布洛維感到芝大社會學系的學術關注十分狹隘，博士生的課程令他沮喪。更要命的是，他沒有學校提供的獎學金或工作，只能耗盡在贊比亞的積蓄勉強度日。出於芝大社會學系以及從范維爾森繼承的人類學民族志傳統，也出於謀生的需要，布洛維在芝加哥南部生產農業機械的艾利斯-查爾默斯公司 (Allis-Chalmers) 找到一份機械操作工的職位，但似乎田野調查也遭到了「詛咒」，他在雷根斯坦圖書館 (Regenstein Library) 的書架上發現了三十年前羅伊 (Donald Roy) 在同一家工廠工作的民族志博士論文，他陷入了恐慌，覺得自己的研究會是二流和多餘之筆<sup>⑬</sup>。

是巧合也是命運，如同在贊比亞遇到西蒙斯、范維爾森和法農，布洛維在芝加哥遇到了威爾遜 (William J. Wilson)、普沃斯基和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年輕的社會學家威爾遜和布洛維同一年來到芝大，他講授的種族關係研討課是唯一能引起布洛維興趣的課程，鼓勵他重新審視南非社會。在芝大的歲月裏，威爾遜多次救布洛維於水火之中，幫他尋找研究資助。

1973年，普沃斯基在巴黎訪學一年後，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到芝大的政治科學系任教，布洛維從書店裏擺放的馬克思主義圖書中意外地發現了普沃斯基新課程的指定參考書目，他說服普沃斯基，讓他留在本不屬自己專業的研討課上，開始了一段從葛蘭西到普蘭察斯再到阿爾都塞的一場「曼妙的智識之旅」。通過普沃斯基，布洛維讀到葛蘭西對美國的霸權 (hegemony) 與工廠的評述。在〈美國主義與福特主義〉(“Americanism and Fordism”) 一文中，葛蘭西認為由於沒有封建主義的歷史包袱，美國的上層建築在數量上是簡化和單一的，霸權不產生於公民社會中，而是產生於工廠之中<sup>⑭</sup>。葛蘭西的觀點提醒了布洛維，讓他意識到自己坐擁着一項大有作為的研究課題——一個完整的生產車間秩序的跨時代比較研究。在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中，布洛維將1944至1974年生產車間裏的變化概念化為從專制秩序(通過強制和製造畏懼)向霸權秩序(通過製造同意)的轉變<sup>⑮</sup>。為解釋這些變化，他將目光投向工廠之外：公司從競爭型企業轉向壟斷型企業，以及國家對勞資關係的嚴格監管。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過程理論之上，布洛維證明了強制不是榨取勞動剩餘價值的唯一途徑，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車間裏有一套「生產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 和意識形態裝置，即「生產政體」(production regime)，它將馬克思筆下的工人階級形成的熔爐轉變為製造資產階級霸權的穩定器。布洛維的生產的政治與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的勞動過程分析一起開創了當代的勞工社會學<sup>⑯</sup>。

批評者質疑道，僅憑個案能說明霸權生產體制是資本主義的特徵嗎？類似賴特在博士畢業後開展了跨國階級結構比較，布洛維繼續研究了日本、英國和瑞典的生產的政治。他發現霸權體制有多種變體，這取決於國家如何通

過發放福利和規範勞資關係來設定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但研究資本主義的本質，僅僅靠展示資本主義下的各種生產霸權是不夠的，布洛維希望將它們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政體進行比較。如同他誤打誤撞地走進了羅伊研究過的同一家芝加哥工廠，布洛維偶然發現了哈拉茲梯 (Miklós Haraszti) 的《工人祖國裏的一名工人》(*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Piece-Rates in Hungary*)<sup>①7</sup>，其中呈現的社會主義生產專制迫使他更嚴肅地思考資本主義早期的專制政體，從而挖掘出一個生產政體的連續譜系——市場專制 (market despotism)、父權專制 (patriarchal despotism)、殖民專制 (colonial despotism)，以及當時美國新出現的霸權專制 (hegemonic despotism)。不同的專制生產政體導向了不同形式的勞工鬥爭——美國的零星反抗、英國的改良主義、俄國的社會革命，由此導出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勞工鬥爭何以潰敗。終於在 1985 年出版的《生產的政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下的工廠政體》(*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中，布洛維為「製造同意」的概念賦予了比較歷史的維度，建立了一套由勞動過程、勞動力供給、市場競爭、國家干預等主要因素組成的比較框架，歷史地呈現出不同工廠政體的形態和形成原因<sup>①8</sup>。他的勞工社會學開始添上一種歷史化的馬克思主義味道。

就在賴特把階級分析的調查問卷帶到更多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時，社會主義國家打開了國門，布洛維在 80 年代跑到匈牙利的國營農場香檳酒廠、班基機械廠 (Bánki) 和列寧鋼鐵廠 (Lenin Steel Work) 的生產車間裏去打工，他希望親眼看到社會主義的工業生產是如何組織的，他希望在生產車間裏弄清楚為甚麼像波蘭團結工會這樣的工人運動出現在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為甚麼社會主義無法建立起一套霸權秩序，他在與盧卡奇 (János Lukács) 合著的《輝煌的過去：走向資本主義的匈牙利的意識形態和現實》(*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一書中給予了解答<sup>①9</sup>。書中指出，工人一方面樂於接受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敘事，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理論和現實 (經濟停滯、工人積極性低) 之間的落差，因而渴望走向市場經濟，但對資本主義同樣存在理論和現實 (勞工環境不穩定、剝削嚴重) 之間的落差缺乏認知。

然而，如果說賴特的跨國比較研究發現愈來愈微不足道，徘徊在不同的社會主義生產車間裏的布洛維也發現生產的政治開始變得不再那麼重要，生產似乎不再是階級鬥爭的中心，階級也不再是生產中最重要的因素。隨着蘇聯解體後全球社會主義體系瓦解，以及全球化勃興下移工、臨時工和自由工作者佔比逐漸增加，性別、種族、公民權、移民、情感等變量打開了勞工社會學新的研究面向。雖然勞工社會學的批判色彩更為濃重，但它的馬克思主義取向卻遭到淡化，變成了真正的社會學命題。布洛維逐漸意識到，勞工社會學者需要從生產車間的勞動過程走出來，投身於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與二十世紀早期不一樣的工人運動<sup>②0</sup>。這既是他後來倡導公共社會學 (public sociology) 的動因，也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要求。

## 四 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因為挽救社會學而陷入了自身的危機，現在輪到社會學挽救馬克思主義了。19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高潮已經褪卻，馬克思主義在取得社會科學中合法地位的同時，也失去了它自身的鋒芒。一場始於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學的挑戰，最終演變成社會學借助馬克思主義復興，誕生了與其他社會學分支並存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命題更多地被人們從理論架構中拆卸下來，然後應用於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具體問題的研究，它愈來愈像一具不斷被掏空的軀體。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群中，除了賴特依然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學術認同，其他成員已經改稱自己為「後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保留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取向，但已投向其他的批判社會理論。賴特的階級分析擺出更多的防守姿態，開始比較與融合韋伯、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等多種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路徑。對於賴特來說，也許只剩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承諾和道德力量讓他堅守自己的學術身份認同，但這份政治承諾和道德力量，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歷史終結論」和戴卓爾 (Margaret Thatcher) 夫人宣布的「〔資本主義外〕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中被擊碎。另一方面，從匈牙利工廠離開的布洛維在蘇聯崩潰的前夜來到莫斯科的工廠，然後又去了科米共和國 (Komi Republic) 的家具廠。布洛維在東歐看到了僵化的國家社會主義向工人民主轉型的希望，但「改造的結果則是資本主義所許諾的燦爛的未來，而不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許諾的未來」；隨後在蘇聯目睹社會主義轉型的真實人間慘劇，他無比失望地看到自己的理論預測和政治期望都落空了。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被現實擊倒，但絕不可以被擊敗。既然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已經破產——資本主義不會自我滅亡且長期持續存在，階級衝突不會演化成革命且會被遏制，社會主義過渡不會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自然發生，社會主義甚至可以倒退、轉型回到資本主義，懷揣社會正義信念的賴特和布洛維決定重新構築一套符合時代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促使兩人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學術合作。他們認為，馬克思的理論預言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它低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和修復能力——尤其是調節和吸納階級矛盾的能力，而經典馬克思主義中又沒有「社會」概念和理論。他們借助社會學提出一套新的資本主義動態理論、階級關係再生產理論，以及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型理論，前者主要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以及如何維穩，而後者則關注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建立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秩序，使經濟和國家都服從自我調節的社會；他們稱之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up>②</sup>。

社會學首先要為馬克思主義注入一個「社會」的概念，但是與社會學裏無所不包的「社會」不同，布洛維指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中的「社會」是指一種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來的特殊歷史產物——「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它的

強弱、特殊結構以及和國家、經濟的關係決定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結果。公民社會被各種力量貫穿，經常被分化或分割成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級、職業等支配領域。公民社會承載着資本主義國家和市場擴張的雙重壓力，它一方面起到穩定資本主義的作用，另一方面提供了超越資本主義的條件。這個「社會」的概念是布洛維從葛蘭西和波蘭尼 (Karl Polanyi) 那裏煉得來的<sup>22</sup>。

從1980年代末開始，布洛維與賴特共同意識到重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更新，設置了包含三個核心理論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框架：第一，資本主義危機循環理論。針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利潤率下降、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不斷加深，導致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面崩潰，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會徹底崩潰，為了克服新的積累危機，它會周期性地、持續地對土地、勞動、貨幣、自然環境、知識乃至更多新事物商品化，把本質上不屬交換範疇的事物變為在市場上進行交換的商品，商品化和市場化可以增加新的資本積累的來源，但也會破壞事物本身的屬性和存在條件，從而引發廣泛的（有可能是經濟增長下的）社會危機，必然會帶來社會的反抗或國家的監管。因此，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再來自利潤率下降和生產過剩，而是來自對自然、社會以及人類自身生存的必要條件的商品化，這意味着市場的交換過程和商品化的經歷——而不是生產的勞動過程和剝削的體驗——將形塑階級鬥爭<sup>23</sup>。這個新的資本主義危機循環理論旨在探究商品化導致社會危機的真實機制，以及這個過程如何導致社會抗爭、國家監管。不同形式的階級力量的形成和組合，影響着社會與國家的發展道路。

第二，資本主義階級矛盾再生產理論。針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反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工人規模增大、交流和分工增強、內部同質性增加、團結意識上升、工人階級形成並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意識不會自然形成，廣泛的階級團結和暴力革命也極少會發生，為了穩定階級結構與緩和階級矛盾，一系列複雜的（包括宏觀和微觀）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機構會發展起來，以保衛和再生產不平等的階級關係。比如，前述布洛維對芝加哥工廠勞動過程的研究，從微觀層面說明了戰後美國資產階級霸權如何在工人階級中確立；普沃斯基和斯普拉格 (John Sprague) 對民主選舉的研究，從宏觀層面說明選舉制度將工人階級政治導向和資本主義制度相一致的實踐<sup>24</sup>。然而，階級關係的社會再生產制度會遭遇挑戰，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也會不斷打破其過去形成的制度方案，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衰退呼喚新的解決方案被生產出來。這個新的資本主義階級矛盾再生產理論旨在研究社會再生產遇到挑戰、侵蝕、矛盾與革新的方式。

第三，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規範化理論。經典馬克思主義中缺乏一套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過去的實踐中，既然資本主義會走向危機並且被壯大的工人階級推翻，社會主義社會便從工人階級的歷史想像中浮現，

由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理想原則所構成：如果私有制是罪惡的，就建立公有制；如果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就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是無序的，就建立計劃經濟。然而，沒有依據證明基於這些原則的反覆社會實驗將保證產生一個平等、民主、高效、繁榮和沒有壓迫的社會。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認為，反對資本主義不足以作為建構社會主義的充分基礎，人們首先要反思已經存在過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因素和制度潛力，這可以避免重蹈覆轍，豐富我們對可行制度的理解，然後要對體現了解放原則的制度設計作出理論說明。然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也無法提供一幅走向社會主義的路線圖。如賴特所言，「路線圖會帶領我們走向已知的目的地，但我們可將具解放性質的社會變革工程視為一次探索之旅。當我們離開熟悉的世界，帶着導航設備，它們告訴我們前進的方向，但卻沒有一張地圖來標明從起點到終點的完整路線。這當然存在風險：我們可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礙，迫使我们朝着未曾計劃的方向前進；我們可能不得不折返，嘗試新的路線。或許，憑藉我們沿途發明的技術，我們可以創造一些人工制高點，從而看到更遠的地方」<sup>25</sup>。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給「社會主義」下了一個理想的定義：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結構，在這種結構下，生產資料由整個社會集體所有。因此，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是通過行使所謂的「社會權力」來實現的。社會權力根植於動員民眾在公民社會中進行各種合作、自願的集體行動的能力。這意味着，公民社會不應僅僅被視為一個活動、社交和交流的場所，而應被視為一個擁有真正權力的場所。社會權力與經濟權力（基於對經濟資源的私人擁有和控制）以及國家權力（基於領土內的規則制定和執行能力）形成對比。其中，「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將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聯繫起來的具體方式：在理想的民主制度下，國家權力服從於社會權力，並對社會權力負責；「社會主義」則是指經濟權力服從於社會權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投資和生產的控制是通過某種社會賦權機制來實現的。社會主義的理想類型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我們可能看到它與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兩個理想類型的不同混合形態和實現路徑<sup>26</sup>，比如基於公民社會民主參與的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發揮主要作用的資本主義，等等。

賴特在1991年初發起了一個「真實烏托邦項目」(The Real Utopias Project)，通過尋找、研究資本主義現實中那些具有解放潛力或社會主義雛形的組織和制度，在理論上提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方案，重新喚起全世界行動者對未來社會主義的想像和希望。基於實證案例，賴特在《構想真實的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認為，作為公民社會集體自我管理的社會主義可在兩個維度上擴展：一是相對於國家的社會賦權——通過參與式預算、公民大會和社會團體民主等深化民主制度；二是相對於經濟的社會賦權——通過維基百科、魁北克工會聯合會團結基金(The Quebec Federation of Labour Solidarity Fund)、蒙德拉貢合作社(Mondragon Corporation)和全民基本收入(UBI)等舉措增強社會主義經濟力量。賴特闡述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轉型理論，提出三種轉型策略：斷裂式轉型(ruptural transformation，革命性地

推翻現存資本主義制度；他對此一直持懷疑態度）、間隙式轉型（*interstitial transformation*，涉及在資本主義內部發展社會自主機構，如合作社、共享平台等），以及共生式轉型（*symbiotic transformation*，國家在現存制度下尋求資本、社會諒解，以推動針對自身的變革）<sup>27</sup>。賴特還提出了「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的概念，認為資本家和勞動者都能從鬥爭中獲益——儘管這些益處是否能夠激發超越資本主義的鬥爭尚不明確<sup>28</sup>。

布洛維和賴特原本計劃以專著的形式系統論述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但由於各自繁忙的學術職務以及更為緊迫的其他學術議程<sup>29</sup>，始終未能完成這一合作。正是在布洛維的建議下，賴特將上述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的第三點，也是相對而言最系統的、基於實證研究的部分，在2010年單獨出版為上述《構想真實的烏托邦》一書<sup>30</sup>。然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還有待未來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去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 五 結語

賴特和布洛維沿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來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廈。一位在精英教育的批判思想遨遊中遇見了馬克思主義，另一位在殖民主義留下的深刻不平等和苦難中遇見了馬克思主義；一位使用統計工具讓階級分析成為有效解釋不平等的社會學理論，另一位通過民族志方法揭示了隱藏在發達資本主義生產車間裏的階級關係再生產的秘密；一位執著於嚴格的科學分析，吸收分析哲學、量化研究、數據比較，從而走向了科學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另一位堅強地應對批評，不斷拓展參與觀察的國家和時間維度，從而走向了比較的歷史化馬克思主義；一位在學術界內部建立了一個緊密的馬克思主義網絡和學術堡壘（由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成立的海文斯社會結構與變遷研究中心[The Haven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賴特去世後更名為海文斯賴特社會正義中心[The Havens Wright Center for Social Justice]）來對抗主流社會學的保守，另一位在學術界外部發動了一場挑戰學術專業壁壘的公共社會學運動；一位要為隕落的社會主義學說提供新的社會學想像力，另一位要為崩潰的國家社會主義提供新的馬克思主義解釋。

賴特與布洛維一生獻身於馬克思主義，他們分別以青年時期的階級分析和生產的政治研究被學界廣為認知，而他們中晚年的學術議程在共同信念驅使下轉向重建馬克思主義，共同提出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和一般命題，並且對其中的一部分理論作出深刻且富有啟發的實證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在此相得益彰。遺憾的是，在他們離世之時，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尚未得到充分發展和完整闡釋，但他們已經為繼續批判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留下了寶貴的理论遺產，讓我們在這一基礎上延續對現實世界的批判和對美好未來的探索。

## 註釋

① Michael 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 194. 筆者採用了任政的翻譯，參見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著，任政譯：〈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安東尼·葛蘭西和卡爾·波蘭尼的互補合一〉，載布洛維著，沈原等譯：《公共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189。

②② Michael 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197; 193-261.

③ 在谷歌學術 (Google Scholar) 的「馬克思主義」關鍵詞下，布洛維和賴特被引用次數排名全世界前兩位。截至2026年3月19日，布洛維的被引用次數是52,874；賴特的被引用次數是51,140。

④ 本文關於賴特的經歷，見於賴特的一次報告，後發表成文。參見 Erik O. Wright, "Falling into Marxism; Choosing to Stay", in *The Disobedient Generation: Social Theorists in the 1960s*, ed. Alan Sica and Stephen Turn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325-49。下引不再另註。直到被診斷出白血病前不久，賴特出於對最新基因檢測技術的好奇做了一次測驗，他驚訝地發現自己不是歐洲白人後裔，而是猶太人，由此追查出父親修改猶太姓氏並對其隱瞞整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的成員知曉幾乎關於賴特的所有事情，但賴特對他們一無所知。賴特反思了自己作為「白人」的「幸福」的代價。在2018年一次非正式聚會上，賴特對筆者和其他幾位師生講述。

⑤ Erik O. Wright, with contributions by Robert Barber et al., *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rison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⑥ 本文關於布洛維的經歷，參見布若威 (Michael Burawoy) 著，聞翔譯：〈叛逆的馬克思主義者 (代譯序)〉，載布若威著，李榮榮譯：《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1-25。下引不再另註。

⑦ Michael Burawoy,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no. 5 (1976): 1050-87. 對該文章重要性的評價來自塞德曼 (Gay Seidman)，她是布洛維的得意門生和親密朋友，同時也是賴特的親密同事、朋友和鄰居。參見 Gay Seidman, "Michael Burawoy's Path: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Back Again", *Critical Sociology* 50, no. 6 (2024): 975。

⑧ Michael Burawoy,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Lusaka, Zambia: University of Zambia, 1972)。

⑨ Erik O. Wright,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⑩ 1979至1982年「西方社會不平等的面向」(Dimensions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Western Societies)；1982至1985年「當代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和階級意識」(Social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Societies)；1984至1986年「有關階級結構和階級意識的跨國調查」(Archiving Cross-national Survey on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85至1987年續期。參見 "Curriculum Vitae" (February 2018), [www.sccc.wisc.edu/soc/faculty/pages/wright/Vita - Erik Olin Wright - March 2018.pdf](http://www.sccc.wisc.edu/soc/faculty/pages/wright/Vita - Erik Olin Wright - March 2018.pdf), 9。

⑪ Erik O. Wright, "Reflections on Classe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2 (January 1987): 24.

⑫ Michael Burawoy, "Introduction: Reaching for the Global", in Michael Burawoy et al.,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2.

⑬ Michael Burawoy, "Living Sociology: On Being in the World One Stud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7, no. 1 (2021): 21; Donald Roy, "Restriction

of Output in a Piecework Machine Shop”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⑭ Antonio Gramsci, “Americanism and Fordism”,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363-401.

⑮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⑯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⑰ Miklós Haraszti,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Piece-Rates in Hungary*, trans. Michael Wright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8).

⑱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

⑲ Michael Burawoy and János Lukács,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⑳ Michael Burawoy, “The Public Turn: From Labor Process to Labor Movement”, *Work and Occupations* 35, no. 4 (2008): 371-87.

㉑ Michael Burawoy and Erik O. Wright, “Sociological Marxism”, in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d. Jonathon H. Turner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LLC, 2001), 473-77. 下引不再另註。

㉒ 資本主義危機循環理論主要來自布洛維對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ights of Our Time*)的借鑒和進一步發展。例如Michael Burawoy, “Marxism after Polanyi”, in *Marxisms in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Critique and Struggle*, ed. Michelle Williams and Vishwas Satgar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52。

㉓ Adam Przeworski and John Sprague,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㉔ Erik O. Wright, “Compass Points: Towards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New Left Review*, vol. 41 (September-October 2006): 105.

㉕ Erik O. Wright, “Compass Points”, 106-107. 根據賴特的定義，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結構，在這種結構下，生產資料為私人所有，因此，資源的配置和使用，以及其用於不同社會目的的方式，都是通過經濟權力的行使來實現的；投資和生產控制是資本所有者行使經濟權力的結果。國家主義是另一種經濟結構，在這種結構下，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因此，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是通過國家權力的行使來實現的，以達到不同的社會目的；國家官員通過某種形式的國家行政機制來控制投資和生產過程。

㉖ Erik O.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0), 2-5, 191-264, 308-65.

㉗ 參見Michael Burawoy, “A Tale of Two Marxists: Remembering Erik Olin Wright (1974-2019)”, *New Left Review*, vol. 121 (January-February 2020): 85-86。

㉘ 布洛維於2003至2006年作為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當選者、主席和退職主席參與學會事項，又在2010至2014年擔任世界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賴特於2010至2013年作為美國社會學會的主席當選者、主席和退職主席參與學會事項。

㉙ Erik O. Wright, preface to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xi, xv-xvi.